

· 历史研究 ·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

何平

(四川大学 南亚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马克思逝世以后,对马克思理论的诠释和实践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局面。马克思思想的架构本身也有一个发展历程。1845年,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范式转型”,即从人道主义哲学批判,转到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究。马克思理论旅行到中国时,正值中国“救亡图存”之际,因此它作为一个有可能使中国扬弃当时的发展困境的新的意识形态而受到关注。郭沫若等中国学者首先尝试把马克思五种生产方式更迭的历史发展模式用于解释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宏观理论与具体场景相协调问题。论文对马克思的“奴隶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以及中国的历史现实进行了对比探究。论文认为,从跨文化和比较思想史的角度对马克思理论的各种释义和与之相联系的实践经验进行再认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世界历史; 中国历史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42(2018)06-0083-08

马克思逝世以后,对马克思的理论的诠释和实践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局面。马克思的理论概念在欧洲、亚洲和拉美等国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被分解、重新组合;一些概念在新的理论结构中被运用,而获得新的含义;另一些概念被挑选出来,与其他概念相组合,形成不同的话语体系。在俄国,它被发展成为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德国,它与工人阶级争取改善生存状况和社会变革的运动相结合,理论被修正了,社会改良和渐进论突出了。在20世纪下半叶,它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理论相融合,激励他们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英国,左翼思想家们从马克思的理论找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在这些情景下,马克思的理论被以不同的方式诠释和发展,甚至理论形态发生变异。这种多样性的产生与当时当地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与接受者的理论和实践需求的差异性相关。本文仅探讨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最早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马克思世界史理论的解读和运用。

一、对马克思思想架构的再认识

马克思跨越和糅合多个文化和学术传统,受到不同理论流派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他的关注点也不同。后来思想界对他的理论的解读,也影响着我们对他的理论的解读。传统的解读注意到马克思理论糅合三种理论传统: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文试图在这种横向分类之外,从纵向来分析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并以此发现马克思思想的演变,其理论的核心范畴和概念的内涵,及其重构演化的过程。

马克思思想的系谱,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的社会进步观。他所出生的特里尔城深受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观念的熏陶,因此从青年时代起,马克思就萌生了要为人自由和进步做贡献的理想。

[作者简介] 何平,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

他的家族祖辈多是犹太拉比,有传教和宣传福音的职业倾向。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似乎分为三个时期,以1845年为分水岭:(1)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人的本质及其发展的探究;(2)意识形态和研究范式转型期;(3)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对其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究。在这些过程中,始终贯穿着马克思想要改变资本主义弊端的思考和行动。

(1)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人的本质及其发展的探究,大致跨越1838—1844年。这一阶段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期。1838年,马克思开始撰写博士论文,研究领域是古希腊哲学。毕业后从1842年起,包括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发表了不少批判普鲁士书报检查令、莱茵省的封建法律和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文章。马克思主要是从人道主义,诸如18世纪关于“人的本质,即(拥有)自由和理性”^①等等哲学信念出发进行批判。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维护普鲁士国家专制体制的思想倾向进行揭露,并开始深入探究黑格尔哲学及其出现的背景。他追溯至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及其语境,很快在费尔巴哈哲学(综合了感觉论唯物主义和关注道德伦理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吸收了卢梭和狄德罗的思想)中找到了扬弃黑格尔哲学的立场和武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唯物论思想,颠倒黑格尔哲学体系,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马克思用人的本质(或人性)的观念取代了作为黑格尔历史哲学主体的“绝对理念”。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马克思对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富于理想主义的阐述。

(2)意识形态和研究范式的转型期。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不清楚是哪些因素导致马克思的思想在1845年这一年发生了重要改变,有人用“认识论的断裂”和“范式转型”等等来形容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从马克思在这一年的著述,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可以看到,他继续从1843年就开始的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倾向的清算^②。在1845年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扬弃了他曾信仰的以黑格尔哲学为内核的意识形态,思索对象“由科学前的总问题转变为科学的总问题”^③。之前,马克思思想的范畴囿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之后,马克思探究所涉及的大多数范畴属于社会 and 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不再满足于从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对普鲁士社会现状的批判,而是开始探究制约人的生存状况的客观环境和社会结构的演化。他意识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马克思注意到“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等因素的作用,放弃了从“人性”出发来论述社会问题的倾向。

这种以人的生存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历史的阐释策略的改变,类似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移。在理论探索中,“问题域”(problematic)的转换,往往“决定了所给定的答案的问题体系”^⑤。马克思进一步思考建立一个崭新的“科学的”哲学和历史理论,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阿尔都塞认为,从1845年起,马克思超越了把历史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外在化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而把人类历史视为是“无主体的”自然历史过程,或者说是以阶级为主体的斗争的过程。此后,马克思在理论上是“反人道主义”的^⑥。

(3)认识论的革命促使马克思着手探究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历史的主体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人的社会关系及影响其生存的其他体制性结构,如“生

①③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18页,第15页。

②意大利学者德拉·沃尔帕和柯莱蒂认为,1843年起,马克思就开始想要扬弃黑格尔思想,这可以在他1843年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看到。参见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1页。

④K.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in Selected Writings, ed. D. McLellan, Oxford and New York, 1977, p. 157.

⑤L.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1970, p. 31.

⑥阿尔都塞《自我批判论文集》洛克英译本,伦敦,1976年版,第51页。

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等概念。1857年马克思撰写《资本论》初稿前,其新理论的基本架构已基本成形。

除了建构有关人类社会的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阐述外,马克思对如何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在《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工资、价格和利润》等著作中,他提出了“一整套适用于他的革命理论计划的术语和概念”^①。巴黎公社起义期间,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面临的局势和对策原则进行了论述,这些可以在后来结集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中看到。

二、马克思理论旅行到中国时的场景

马克思逝世以后,在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其理论的运用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理论的某些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发生了偏移。在英国,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再局限于是与基础相对应的思想上的反映,而具有政治学含义。英国学者发展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并据此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幻想。在俄国,在确定以暴力革命实现社会变革的路线下,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条件的说法被重新解释。可以发现,“每一个(新的诠释)文本和每一个读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理论立场的产物”^②。这个理论立场是由其在所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他所设想的改造社会的蓝图所决定。

马克思理论旅行到中国时,中国传统文明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正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下,仁人志士们早已在思考如何摆脱这种困境。1860年起,开明的官吏和士绅已经意识到需要向西方学习和借鉴,从西方物质文明(坚船利炮、新兴产业和交通设施)到法制和政权形式,再到其文化精神,这种学习是不情愿的,并且是逐次被迫展开的。如果没有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所引发的民族意识的危机,中国也许就沿着一条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走下去了。在经过半个世纪的救亡图强和向西方学习,却仍然连领土完整和主权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情景下,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一种批判西方体制,并主张通过革命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越来越吸引激进思想家的注意。

1919年8月,“五四运动”的尾声中,中共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就写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号召不仅要宣传类似布尔什维克那样的“主义”,而且要依据这种理论及其原则实践。李大钊认为社会改良主义行不通,对于中国这样缺乏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③,中国必须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作指导,通过革命实现经济结构的改造。

马克思理论虽然提供了一个使中国扬弃当时的发展困境的意识形态,但它同其他社会政治理论一样,在跨文化旅行的过程中,也面临无法完美解释当地(中国)场景的情况。而且,出现了一个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的实现了的版本——“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再加上帮助建构了这样一个社会的领袖人物,如列宁和斯大林等有对马克思思想的诠释,这些都增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解读和运用马克思理论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特别需要实践者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欧洲、苏

^①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7页。

^②爱德华·萨伊德《旅行中的理论》,爱德华·萨伊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23页。

^③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俄和中国“诸情景间差异的认识”^① 并对实践方案是否切合中国现实有清醒的认知。

三、郭沫若对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解读

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叙述了一个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这段话实际上包含了马克思对他之前的世界历史发展模式的一个概括。革命斗争的需要曾使列宁和斯大林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模式抽象为人类社会演化的一般规律,因此也包括苏俄的历史发展在内。同样的需要,以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也使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家这样做。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写道:“《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③。郭沫若在把这个经济社会形态演化理论套用于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上发挥了突出的作用。郭沫若认为“旧的名和旧的实已经‘绝而无交’,……(必须)采取新化一途了”^④,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⑤。郭沫若断言,“殷代已进入奴隶社会”^⑥,“周室东迁以后,中国的社会才由奴隶制逐渐转入了真正的封建制”^⑦。他否认“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秦时就崩溃了”^⑧。郭沫若是这样诠释马克思那段关于五种生产方式演化的关键话语的“他(马克思)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纪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那不用说就是现在的资本制度了。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⑨

郭沫若显然认识到为了论证马克思革命理论在若干竞争的理论中更适用于中国,就必须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

四、“奴隶制”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在1845-1846年所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回顾了之前欧洲的历史。他首先提出一个命题,“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和发展程度”^⑩。民族内部的分工引起工业和商业以及农业劳动的分离,城乡的分离和利益的对立。在民族之间交往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民族劳动的分工也决定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在马克思眼中,“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⑪从这种视角,马克思讨论欧洲历史上出现的几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部落所有制”“是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

①爱德华·萨伊德《旅行中的理论》,爱德华·萨伊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第423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③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0页。

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页。

⑤⑥⑦⑧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页,第2页,第22页,第23页。

⑨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页。

⑩⑪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第26页。

然保存着奴隶制。”^①这里,马克思显然是指古典时期希腊和罗马的奴隶制。

应当说,尚没有足够的文字和考古学证据支撑中国古代存在类似欧洲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社会。从商、周直到宋代,中国社会存在多种形式的“奴隶”,有时数量还很大,但没有具体证据证明其达到了希腊和罗马那样高的占人口总数的比例。此外,“奴隶制”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劳动方式,似乎只要在法律、习俗或某一群体的权威构成了高压统治或强制劳动的社会环境,就会出现。这使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奴隶在跨度如此大的历史时期(从商代直到宋代)都可以看到。此外,在中国社会中,即使是奴隶占比较高的时期,也没有出现在这种生产方式(强制性的劳动)之上的,类似雅典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那样的上层建筑。我们因此不能说奴隶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也不能说它是一种普遍的,有一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配套的社会经济形态。

考察世界古代史,可以发现,希腊和罗马的奴隶制的出现有非常特殊的环境。第一是战争获得大量的战俘;第二是雅典和罗马是工商业非常发达的“大城市”,与周边广大地区有大量的经济和军事交往,而这两个城市本身的人口并不多。征战以及维持与广大地区的经贸往来需要大量人口生产物品,支撑战事的后勤和城市建设等等。“奴隶在希腊社会中很普遍,而且……被看作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必要部分,……这些‘有人脚的动物’,……承担着来自农田、家庭、工匠作坊和商店、矿井、修建计划甚至公共服务活动等方面的沉重负担”^②。在“雅典的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九万人,而男女奴隶为三十六万五千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放的奴隶为四万五千人。”^③“奴隶制仍然是罗马帝国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对经济至关重要的一种制度,奴隶在整个帝国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据估计,在公元1世纪时,意大利人口有700万到800万,其中约有1/3是奴隶。他们从事家仆、农业劳力,城市工厂的工人、店员、教师、矿工、船夫和角斗士等职业……主人对奴隶拥有完全的控制权。”^④

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劳动方式,奴隶制在18、19世纪的北美大陆的庄园中也出现过,那时,美国的政治上层建筑是联邦共和制。在罗马,经济基础——奴隶制没有变化时,上层建筑可以由共和制变化到帝国政制。因此不能说奴隶制本身代表了一种完整的经济社会形态,即上面必然矗立某种固定的政府形式,它也不是只能出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一个必然阶段。五种生产方式的更替因此只是欧洲历史演进的一个序列,而不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各国随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依次出现的模式。

五、亚细亚生产方式

中国是一个有着和欧洲乃至印度都不同的文明和历史的国度,马克思虽然写了好几篇文章讨论中国的时政,例如英国和俄国对华战争、鸦片贸易等,但他很少深入分析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也没有详细讨论过中国的历史发展。马克思用涵括中国的地名“Asiatic”来命名一种生产方式,主要是出现在他对印度经济社会状况的论述中。例如在1858年下半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写道,“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有制形式”^⑤。后人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用于涵盖中国,实际上是没有看到其概括缺乏充分性。

^①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8页。

^{②④}理查德·E.苏里文,丹尼斯·谢尔曼,约翰·B.哈里森著《西方文明史》,赵宇烽、赵伯炜译,海口市: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第159页。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

马克思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最早谈到东方的印度是一个以土地公有制和村社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在1853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评论时政的几篇文章中,例如其中的一篇讨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6月10日)的文章中,马克思描述了印度这个亚洲社会的特征:中央政府承担举办兴修水利这样的大规模公共工程;政治和社会发展基本停滞(“始终没有改变”);农村中家庭劳作结合农业和手工业,村社基本是“独立的”,“闭关自守的”,不受国家政治变化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这种社会制度从古延续到19世纪^①。在1853年7月22日所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用了“亚洲式的社会”这个词,再次提到被英国入侵和殖民所破坏的印度社会的原有特征“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互不相来往的农村公社的“自治”和“自给自足的情性”、“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②。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评论说“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的特征,“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③“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④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使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并将其置于其提出的诸社会经济形态演化序列的首位^⑤。这就是那段被视为马克思世界史理论的精髓,并且引起极大争论的话“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⑥。

马克思在《资本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和某些方面又进行了一些讨论。大体上来说,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眼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如下一些特征:缺乏土地的私人所有制、自给自足的村舍、专制中央政权管理水利灌溉系统等公共工程、国家掌握军队,以交纳贡赋、强制劳役等手段榨取乡村的产品剩余。

但是,自始至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怎样从理论上认识和概括亚洲的经济社会形态以及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形态都颇有踌躇。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历史上的生产方式的理论概括中,没有提到亚洲的生产方式。在1857—1858年所写的Grundrisse中的“前资本主义形态”章节中,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列在其建构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序列的“原始公社”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奴隶制以及封建制,在他看来都是劳动者和生产手段未分离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1867年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后,马克思似乎就不再在其著述中提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恩格斯在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没有提到这个概念。

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论著发表后,恩格斯修正了以前的一些说法。在188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注释中,恩格斯承认,他们基于1847年前学术界对史前社会的很不够的研究成果,对有文字记载前的社会的认知有误,并且同意此后许多学者,尤其是摩尔根的研究所揭示的从俄罗斯到条顿民族,从印度到爱尔兰,普遍存在的村社公有制,以及村社解体后,社会才分化出对立的阶级的情况。恩格斯实际上承认了他们以前所指认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某些关键内涵,如村社公有制并不是亚洲古代社会特有的。涉及到中国古代社会时,恩格斯实际上也不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土地大多是国有,而不是公有制。

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定义,读者仅能从他前后不同的著述中梳理出其特征。这个概念的内涵诸要素似乎也缺乏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字面意义即亚洲的生产方式)的概括最初仅根据对印度社会的认知,而且是通过阅读他人的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65、66页,第69、70、71、72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5页,第478页。

⑤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第83页。

观察。显然,仅根据印度个案,即使是准确的,这样的概括也是不充分的。在那段简练,而又高度概括的论述中,马克思用地名(亚细亚)来指称一种生产方式,其后又用一个时代(古代的)来标示其生产方式,再后是两个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显示出了马克思在此阶段对人类历史演化模式的研究还未达到成熟的阶段。马克思在建构一个囊括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模式时,对亚洲社会的认知可能受到黑格尔的影响^①,黑格尔认定东方是历史的起点,社会专制和停滞。此外,虽然马克思那段著名的论述是在阐述人类社会发端、社会的结构和发展变化的一般模式后的概括性归纳,给人以涵盖人类各地区的发展模式的感觉,但他在这段话之前,用了“一般来说”这个词组,这也就是说,有例外。作为一位学者,马克思在做出论断时,也是相当谨慎的。

后来,1877年,马克思还在通信中公开反对把这个经济社会形态演化模式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马克思写道,“他(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②。

“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模糊性,以及马克思前后似乎有些许冲突的解说,给后来的马克思的信徒在诠释和运用这个概念是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20世纪初,第二国际借此概念讽喻亚洲的落后,列宁也论述了“沙俄的亚细亚特征”。斯大林却不再使用这个概念,因为他领导下的第三国际需要鼓励殖民地社会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盟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土“封建”统治阶级。到1930年,“亚细亚生产方式”就被排除在斯大林认可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模式之外。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在20世纪中叶的西欧却遭遇了不同的命运。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思潮中,团结在法国《思想》杂志周围的左翼思想家如莫瑞斯·迦达利尔(Maurice Godelier)等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具有中心地位。金·切斯尼克斯(Jean Chesneaux)把这个概念的外延,即适用范围从亚洲延展到包括一系列不同的传统社会,但他们把这个带有欧洲中心论的概念改造了,扬弃了关于此类前资本主义非西方社会处于停滞和欠发展状况的观念。另一些学者如马克西米·罗丁森(Maxime Rodinson)则认为这个概念过于简化和粗糙,不足以涵括极为复杂的不同的社会形态。克劳德·麦拉索克斯(Claude Meillassoux)批评这个概念概括过度,混淆了国家以强制缴纳贡赋来榨取生产剩余的诸多此类社会的不同点。1978年,萨伊德在其《东方主义》一书中,把这个概念视为与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相联系的文化偏见。此后,这个概念在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基本被抛弃。

国外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诠释和改造充分说明了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复杂性。迄今为止,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世界文明存在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把欧洲历史模式套用于其他地区的文明发展,是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的表现。哈贝马斯在质疑把五种生产方式序列的逻辑更迭作为普遍形式的事实基础时就写道,我们不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某种普遍的发展阶段,还是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生产方式并行的阶级社会发展的特殊形式。非西方的前资本主义历史也不能证实“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曾以纯粹的西欧形式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而普遍存在过,也不存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普遍规律^③。教条主义似的套用欧洲历史发展模式会束缚历史研究,正如萨伊德所

^①从亚里斯多德到孟德斯鸠和黑格尔,都视亚洲为专制和停滞社会的故乡。

^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页。

^③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150页。

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变为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陷阱”^①。

结语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和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想,它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并没有过时。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应该采取斯莱格尔的循环论诠释学方法,即从他提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道德立场出发,而不是局限于它的一些结论。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我们应该关注马克思提出的“理论总问题”^②,对马克思理论的关键概念或术语的解读和运用,应该分析其“在总问题中的作用”,它“在‘理论’体系中所占的地位”,来确定其本质^③。我们应该区分哪些后人后来从马克思理论中的众多范畴和概念,或其某一部分发展出的观念、方法和策略,以及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毫无疑问,1989年以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实践的失败,但这也只是马克思的理论旅行中发生的一种情况。

马克思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启蒙精神的继承者,他体现了类似普罗米修斯一样的为人类献身的精神,他也有激进的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精神,这些都是马克思具有生命力的精神遗产。^④我们应该区分马克思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和精神实质,也需要具备一种跨文化和比较思想史的批判意识,以强化从而帮助我们对理论被应用的特殊和具体的环境进行分析,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释义和与之相联系的历史经验进行再认知。

[责任编辑:翁惠明 wenghm@vip.163.com]

^①爱德华·萨伊德《旅行中的理论》,载爱德华·萨伊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23页。

^{②③}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2页,第23页。

^④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ways of textual analysis, and in revisiting a great number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hitherto overlooked. In doing so, I attempt to offer a re-reading of Russian formalist theory by contextualizing its place in Soviet-Russian leftist avant-garde art movement, specifically that of Cub-futurism and Constructivism. Contextualization effort such as this should point out the close historical ties existed between the Russian formalists' quest for a paradigm shift in the domain of literary studies on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the creative experimentations undertook by Soviet-Russian leftist avant-garde artists in various fields of visual arts, such as painting and film making. Lastly, my study aims to elucidate, albeit tentatively, the unique visual experience, or "visuality" inherent in Russian formalist literary theories. Following thi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cultural-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at underlies leftist avant-garde ar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Soviet Russia.

Mystery Legend in Mo Yan's Novels

SUN Junjie, ZHANG Xuejun

Mo Yan's novels possess the quality of mystery legend, pay attention to the description of strange people, stories and things and intersperse ghost stories in his novels. These creations and writing way all reflect the folk culture in Qi district and childhood of Mo Yan. They are vivid descriptions to folk life with magic and realistic quality. They are also conscious response to literary tradition. All these leads to virtual and realistic, strange and weird aesthetic style. Meanwhile, description to strange and weird things reflects Mo Yan's pursuit to entertainment of novels and obsession to mystery culture. There are introspection and criticism to history, society and humanity in the entertainment.

A Returning Night Stalker: The Value of Feng Zikai's Potential Writing During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WANG Yao

Written by Feng Zikai, *Yuanyuan Hall Essay* Continued and more than 100 letters for his relatives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in his potential writing. This versatile artist was usually distinguished for his hermit image in academic circle, while sometimes his writing style was just like a fighter,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However, instead of sticking to fighting state, after suspending creation for 3 years because of a political event, he struggled for a long time in holding on and giving in. Ultimately, he chose to return to his initial creative mode both in thoughts and skills on his literary works' composition. Hidden behind alienating crucial incidents and diluting political influences, it was an alternative way of resistance that became his spiritual core. His alienation of the speech of the times reflected his mild quality. By this way, he was just like a stalker wandering in a dark night who broke through his inner self and became a typical cultural symbol in a special era by his unique perseverance and vitality.

Marxism, World History and Chinese History

HE Ping

After the death of Marx, the way of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of Marx's theory diversified. Marx's thought itself also has a development process. In 1845, Marx's intellectual inquiry had a "paradigm shift", from the humanitarian philosophical critique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society 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hen Marx's theory traveled to China, it was at the time when China was searching a way to "avoid be perished under foreign aggressions", so it drew attention as a new ideology that might enable China to get out of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the time. Guo Moruo and other Chinese scholars first tried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y via Marx's theory of the succession of five productive mode. In this process, there has been a problem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macro theory and specific scenarios. This essay attempts to clarify Marx's concepts of "slavery" and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historical reality of China. The thesis holds that re-recognizing th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Marx's theory an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ssociated with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and 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field of contemporary Marxism.